

一、家世与幼年教育

费孝通名字的由来

母亲的教育优先原则

总是粗心又抢先交卷的学生

因体弱多病而进了女校

不拿戒尺的沈老师

肿着手写字的王校长

父亲的教育调查报告

乡土教育的终身影响

迎接费孝通来到世间的，是太湖流域典型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同时又是一个新思想充盈、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父母亲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先进人物。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曾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早在费孝通出生之前，就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也受到了良好教育。

二十世纪初年，“教育救国论”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影响。费璞安回国后，倡导新学并付诸行动，在家乡吴江创办新式中等学校。杨纫兰配合丈夫的工作，开办了吴江的第一所幼儿园，当时叫“蒙养院”。夫妇共襄教育盛事，同开风气，各有天地，珠联璧合，成为家乡当年一段佳话。

和费家交情很深的著名实业家张謇也非常看重教育，尤重师范教育。他在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时即要求广开学堂，并强调师范教育又是普通教育的基础。所以，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开办新式学堂，首开师范学堂。在一九〇三年春正式开办的通州师范学校，首批延聘的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后来，费璞安也被张謇聘往通州，从事师范教育。

费孝通这个姓名中的“孝通”二字，就来源于费璞安在通州教书的这段经历。为纪念在通州的教书生活，先确定了“通”字。又由于张謇与费家关系甚好，张謇的儿辈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的友

情 费璞安就为自己这第五个孩子取名为“孝通”。

父母亲都重视教育，当儿女的深得其益，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费家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正规教育。

费孝通排行第五。大哥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二哥费青由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三哥费霍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姐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专攻缫丝新技术。费孝通从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负笈英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且有幸在清华和伦敦先后师从人类学界泰斗级的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两位教授，为费孝通日后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学业辉煌时，父母艰辛处。费孝通的幼年时期，费璞安上有母亲和姨母，下有妻子儿女，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自己微薄的工资供养。他在《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中，曾提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同事发起组织红十字会一事。当时要筹款制备担架药品，也需有日常办公费用。热心参与者中，有人捐一千元，有人捐两千元。费璞安记载自己认捐时的情况道：“我是穷汉，亦竭力写捐五十元。”

捐款五十元已是竭力而为。在这样的境况下，杨纫兰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个九口之家，还要保证儿女们的教育费用，确实不易。

杨纫兰有心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家庭收入却又要承受不起全都送进大学的负担，她就采取隔一跳一的办法，让老大读大学，老二读专科，老三读大学，老四读专科……专科学校当时是不收费的，所以节约出了一些钱，来确保孩子们全都能接受正规教育。

一次，杨纫兰病重时，把费孝通的哥哥们叫到床头，让他们根

据家中历年的日用帐目进行统计，列表分析，按各项支出描出曲线，作出比较。结果，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母亲指着图表说，自己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在各项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费用，然后再以余钱安排其他，这就是“教育优先”的原则。

当时的费孝通正读中学，已经能够意会到母亲话中的深意。后来，母亲在临终时又一次谈到她对子女的教育，说：“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她说的“最小的一个”就是费孝通。其实，对这个早年体弱多病的小儿子，母亲何尝没有尽力，又怎能不尽心竭力！只是上天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没有让她亲眼看到最小的儿子完成全部学业罢了。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〇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这所初小的校址，是原先供奉雷神的雷震殿，所以人们通常叫成是雷震殿小学。在四年初小的课程当中，费孝通最喜欢听沈天民校长讲的乡土志。这是一位家道清寒却从不言苦的校长，一生的心血全部用在了家乡儿童的教育成长上。费孝通爱听他的课，除了敬爱他人格的因素，也许还与乡土志这门课的内容比较鲜活有关。

沈校长在课堂上讲给孩子们听的，多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又都是他们想知道的知识。费孝通和小伙伴时常去垂虹桥和鲈香亭玩耍，沈校长给他们讲这地方的风物人情时，就配上“松江鲈鱼肥”这样的诗句，使孩子们从熟悉的地方领略到了新鲜，开阔了视野，也增加了情趣。

和乡土志比起来，其他功课的知识就显得死板一些，难以使天性活泼的费孝通保持很高的兴趣。上课时，经常有小动作，不能始终安心听讲。算学课上，往往定不住心思做算题，脑筋里总念着课后到走廊和操场上玩“捉逃犯”的游戏。习题做得飞快，过后也不爱再看一遍，时常把 6 写成 8，把 2 写成 3。每逢课堂小测验或正式考

试，费孝通总要抢着第一个交卷。在家里临摹碑帖练毛笔字，也是快快完成预定作业，对母亲说一声“我涂完了”，就又冲进游戏当中。学校的老师督促费孝通写日记，他写过“晨起，上课，游戏，睡觉”之后，第二天执笔苦思，再无啥可写，便写下“同上”两字。费孝通一九三五年初写过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说到自己当时的情况：“像我这样乱烘烘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

小学时代的费孝通，性情活泼好动，身体却羸弱多病，时常因病请假，缺课在家。小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废物”。一天，费孝通又病在床上，他拉着母亲的手问：“为什么我要姓费？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

对这样多病却又爱动的儿子，母亲为之操心费神的程度，依照常理不难想象。如果在游戏玩耍中发生冲突，体质羸弱的费孝通不占优势，而活跃多动的性情又容易使他和顽皮好斗的孩子玩在一起，这种缘故使母亲不敢把费孝通送入普通的学校。

一九二〇年，费家从费孝通出生的那个小镇搬到了苏州。事有凑巧，苏州有一所振华女校，是杨纫兰的一位朋友王季玉创办的。当时校址在十全街，距费家搬到苏州后的住所较近。一般来说，女学生不像男学生那样顽皮，也不像有些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所以，杨纫兰就把最小的儿子费孝通领到了王季玉面前，费孝通成了振华女校里的少数男学生之一。

身为男生而入了女校，在特定的年龄段上，会是当事者很不愿提到的事情。费孝通在后来的中学时期，就很怕有人提起这段经历。可越是怕，越是成了同学们取笑他的把柄。不过，费孝通在振华女校遇到了一位名叫沈骊英的女教师，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在此前的四年初小课程中，老师采用的那套旧的教学方法，给年纪尚幼的费孝通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打手心的是老师，罚站墙

角的也是老师。在费孝通心里，老师的形象是一个似乎不太理解学生，永远也不会理解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进入振华女校就读高小后，费孝通遇到的这位“沈先生”却是一个拉着他的小手，满面笑容，手里不拿戒尺的老师。往后的日子里，从没有打过这个顽皮孩子的手心，也没有关过这个冒失鬼的禁闭。看着费孝通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沈先生只是微微地摇头，轻轻地问：“你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当时的费孝通一定会有些异样的感受：原来，老师也可以这么做的。

沈骊英不光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而且人格高尚。离开讲台后，她曾到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专心改良麦种，成了农民的恩人。她有一次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却把所里的麦种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费孝通在三十五岁上写出的《一封未拆的信》这篇文章里记述说：

她默默的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的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的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这位可亲可敬的女教师，一生都用来树谷、树木和树人，最后因脑溢血而殉职于她的试验室。她也许没有说过很多要做什么事

的话，却以很高的做人做事标准去行动，为学生和农民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人己之间，施予人的远远超过了求于人的。这种做人做事的风范，应当说是对费孝通早年的精神成长具有相当的影响。虽然他初见沈骊英时只有十岁，但他天资聪颖，感觉敏锐，观察细致，尤其是对人格因素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所以，忙乱的步伐，匆忙的神色，醉心的游戏，冒失的状态，都不影响他对周围人与事的感知，尤其是对能够提升人格的人与事的细微体察和心仪神会。在回忆和纪念‘沈先生’的文章里，费孝通的另一段话是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他这样写道：

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姊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有这样的心声，可以使人相信，像沈骊英这样的老师播洒于孩子们心头的化雨春风，在费孝通一生当中，不仅不会被遗忘，而且会是常绿的，是永远‘苍翠’而富于生机的。

和上面这两段引文的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一九八三年，费孝通又写了一篇题为《念振华母校》的文章，谈到早年就读振华女校时的日常感受。谈到该校校长，即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

王季玉也是一位女教师，留学回国后，全身心地投入振华女校的教育工作，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苏州的冬天是冷冽的，在艰难中维持正常局面的振华女校，没有保温设备。孩子们穿得像泥菩萨般

偎在课桌旁，一双双小手冻得生疼。“拜拜天，今天不要上台写黑板字吧。”孩子们怕手更疼，常常这样私语。王季玉明白他们的心思，不让他们上黑板，自己却在黑板上写字给孩子们读。

一天，费孝通发现老师的黑板字写得特别大，而且明显不如往日里整齐。再看老师的手，居然肿得“像一只新鲜的佛手”。原来，王季玉每天早上都要洗衣服，在冬天里弄得一手冻疮。她不会因此而耽搁孩子们上课，孩子们又都袖着手不肯板书，只好自己肿着手在黑板上慢慢移动。生着冻疮的手提起来在黑板上写字的疼劲，费孝通是很知道的。这个平素就体弱多病的孩子，似乎要比其他同学更能体察老师的病痛之苦，也就更深一层地领受到老师对他们那一份深厚的爱意。可想而知，费孝通因病卧床而缺课的时候，他是很想坐在王季玉先生面前听课的。课堂上那种和传授知识相伴而至的人格熏陶，对整日里似乎乱烘烘的费孝通，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早年的费孝通，在接受教育这方面，确实多有幸运之处。在学校有沈骊英、王季玉这样优秀的教师。回到家，又有很出色的父母。那个时期的费孝通，常因病缺课，减少了在校和老师接触的时间，却也因此而增加了接触父亲的工作的机会。

当时，他的父亲任江苏省视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督导员。为做好这项工作，父亲一年当中有一多半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作教育情况调查，回家期间就忙于写调查报告。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书桌上就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到的材料和所作的笔记。费孝通出于好奇，有时就趁父亲不在场，偷偷去翻阅这些材料和笔记。材料多是各地学校提供的情况介绍，有很多数据，对一个孩子来讲，未免枯燥。费孝通更感兴趣的，印象更深的，是父亲

的笔记。笔记中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对任课教师的教法和讲课特点作出评价。这些十分生动、具体而富于现场感的笔记，都融进了父亲的思考和调查报告当中，也融进了费孝通对父亲的早期印象里。

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费璞安先生的遗墨上看，他的字相当见功力。但他每写就一篇调查报告，都要郑重其事地请本乡一位书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写出来。这时，费孝通的两位哥哥就被父亲指定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费孝通因为年纪小，只在旁边陪坐。他后来写《记小学乡土教育》一文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发现未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当时对费孝通影响更大的，也许是费璞安每次外出调查带回家的地方志书。这些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民俗的书，在费家有满满一书架。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他后来在大学毕业前写论文时，就是用全国各地的方志当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资料，在吴文藻、潘光旦等教授们的指导下，五易其稿，完成了《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一文。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又过了六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时，仍

然把它看成“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

一九九六年，费孝通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把自己六十年学术生涯的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乡土”一词，总共只有六道笔画，然而这笔画简单的词语当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从早年起，直到现在，“乡土”伴随费孝通经历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还将继续伴随他走下去。费孝通的一生，是生命、热情、智慧、责任、劳动和乡土水乳交融的一生。要了解费孝通，离不开对乡土的了解；要理解费孝通，离不开对乡土的理解；要体验费孝通的生命感受，离不开对乡土的深切体验。

多年来，费孝通曾多次以“来自泥土”为题旨讲述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既可看成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注解，也可看成是他对自己的注解。

二、中学和大学预科

父亲当选吴江县议长
母亲为先进人物著述作序
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
惊呼自己处女作的发表
留意启示人生意义的事情
升入东吴大学选修医科
学生当中的进步分子
转学燕京弃医读社会学

在东西方文化正面碰头、全面接触的二十世纪初，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中国的农村社会里非常边远的村庄。在这种情势下，“乡土”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样子。它既保留有传统的内容，也被注入了新的元素。当时的费孝通，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和社会上，所受的早期教育与熏陶，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影响，既有传统的乡风土韵，也有东西方文化交汇之下的思潮和学说。

这一点，在费孝通出生的这个家庭里就表现得相当典型。他早年在吴江生活时，晚上出门，总要提个灯笼作照明之用。这灯笼上贴着的“江夏费”三字，说明费家曾是望族。到费孝通的上一两代，尚余祖荫。然而在时代变迁的推力下，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已经是一个创办新学、领导光复吴江、当选吴江县议会议长的新派人物了。

据《江夏费氏世谱》记载，费璞安曾经担任过家乡同里镇的费氏族长。辛亥革命前半年，根据清廷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吴江县的民众选举成立了县议会。费璞安当时在南通任教，并没有回吴江投票，却被民选为议员，后又当选为议长。

吴江光复前，费璞安在吴江以县议会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之事。他在《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中记述说：

当时吴江县、震泽县两知县和武职都司、吴江的知名

人士和不少民众均到会，一致表示赞成光复。散会后，我即赶赴苏州都督府商定光复吴江日期。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历十一月十五日，后苏州光复十天），由苏都督府派光复军（亦称革命军）五十人成一小队，荷枪实弹，沿塘步行到江。我在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宣布光复吴江，迎接光复军。开会仪式十分隆重，光复军列队庭中，号鼓齐鸣，排枪并发，高升白旗，民众欢呼。……我以县议会议长名义就主席位，正式宣布光复，并说明今后政权改为民主，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并进行了宣誓仪式。

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在民国成立、各省议会成立、国会成立的局势下，他联合吴县、上海、常熟、如皋四县议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的县议会联合会，在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后来，费璞安又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会，并被推为江苏省晋京请愿总代表，赴京后，利用贾家胡同吴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各省代表又共推他代表全国人民晋见段祺瑞，呼吁恢复县议会的正常运转，费璞安在当时社会进步力量中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杰出女性，站在当时社会潮流的最前边，为民众的思想启蒙而大声疾呼。

一九〇三年，清朝气数将尽，暗夜沉沉。杨纫兰的一篇《爱自由者金一著〈女界钟〉序》却似黄钟大吕，撞击着千万同胞的耳鼓。

溺于社会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现在社会之人非独不知未来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况女子哉。女

子者居社会之半部分，以平权之理论之，女子亦居国民之半部分。国民者何也，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阁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顺从之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并白以外无能力，鍼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缚形骸，无论未来之新国民如罗兰夫人、批茶女士、苏菲亚若安之流，言之适遭怪异，即中国已往人物如班昭、谢韞、木兰、冯夫人、梁红玉、聂隐娘之流亦不过低头咋舌，以为不可及，而如其奋发投袂，起而效之，则一以为魔怪，一以为风狂。群聚而游，不见容于社会。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帕，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时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三万言。掎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阱，而登之于平权自由之乐土。其文章则流丽芬芳，语重心重，其议论则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苟开卷熟复，其必有奋发投袂而起，以逐诸女杰之后尘者，则我谓此书为美利坚之自由钟可也，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

杨绛兰的这篇文章，对于体察费孝通早年的成长环境十分重要，其中可供读者从当时整个社会心理状况一直看到杨绛兰的胸襟，视野，见识，抱负。这就是费孝通的母亲，一个在大时代中对社稷沉浮和同胞命运怀有深切关注的母亲。她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究其根源，实出于此。

这篇文章写出的第五年秋瑾在《中国女报》发表《感时》二章，其二如下：